第3章

明清儒学研究

1. 前言

本文以2015年韩国发表的与中国明清儒学相关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本文选取论文的主要途径是韩国研究财团论文发表平台(KCI)以及各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包括杨先进的《探讨王阳明和亨利·伯格森的生命论以及哲学对话的运用》(忠南大学)。

韩国研究财团论文发表平台收录的论文时间限制在2015年1月到12月期间。本报告将采用韩国研究财团的论文分类方式对相关论文进行分类。即、哲学类刊物25个、儒学4个、其他人文学1个、汉语及中国文化1个、以及历史学19个。因此、包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学术论文在内、总共有23篇论文(博士论文的1篇不包括在内)。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论文、以下按照人物类别进行了分类。

2. 按照人物类别分类

1) 与王阳明有关的论文(9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Hwang, Gap Yeon	考察阳明批判朱子哲学时的“适否”	《泛韩哲学》第79集	泛韩哲学会
2	Kwuan, Hyang	阳明哲学中良知的体用观：与朱子“理”之比较	《哲学论丛》第81集第3卷	新韩哲学会
3	Kim, Hye Su	张横渠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解读：张横渠气论中阳明学的体现和适用	《阳明学》第41号	阳明学会
4	Lim, Hong Tae	通过比喻来认识阳明的学习论	《韩国哲学论集》第45辑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5	Hwang, Gap Yeon	通过诗情来认识王守仁的哲学思维世界	《中国学报》第72辑	韩国中国学会
6	An, Yeong Seok	朱子和阳明的道德教育论研究	《儒学研究》第32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
7	Lee, U Jin	新儒学的儿童教育：以朱子与王阳明为中心	《阳明学》第41号	阳明学会
8	Kim, Jun Seung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的知行合一：比较鲁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9	Kim, Jun Seung	王阳明思想中人的潜力	《东洋哲学研究》第82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在全部23篇论文中、关于王阳明的论文有9篇、即占百分之三十。这与去年相比、比重和数量略有下降、去年18篇论文中关于王阳明的论文共有10篇、即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在对明清时期儒学研究的领域、关于王阳明的研究仍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一年之中有9篇论文数量也并不能算多、但是就论文主题的丰富多样性来看、却十分令人欣慰鼓舞。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各文章的主题、首先、我们将对前三篇论文

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探讨。Hwang, Gap Yeon的论文在讨论王阳明对朱子学进行批判之正当性的同时、揭示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差异性。Kwuan, Hyang的论文则主要说明了作为阳明学说核心之良知的体用。Kim, Hye Su的论文将阳明学气论的倾向性与张载的气哲学相结合进行了阐释。第四、五篇论文则进一步拓展我们理解阳明思想的方式。Lim, Hong Tae通过说明阳明所使用的比喻方式来介绍阳明思想的本质。Hwang, Gap Yeon的文章则是通过阳明的诗作来理解阳明思想的内在。剩下的四篇文章则是从教育学的层面来理解阳明学。这也是2015年韩国儒学研究领域十分显著的特征之一。An, Yeong Seok和Lee,UJin的论文从现在教育学的角度对阳明和朱子思想的差异进行了说明。Kim, Jun Seung的一篇论文主要是对阳明学重要特征之人的潜力的部分进行了整理并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而另一篇论文则是将这一特征代入到儿童教育中、将其与鲁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相比较、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2) 王廷相(1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Kwuan, O Hyang	王廷相的知识论	《东洋哲学研究》第83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在韩国学界、关于王廷相的研究迄今为止几乎是空白。这是由于在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的大框架下、探讨明代思想时、学者们大多会集中探讨阳明心学。但是在中国学界、除了理学和心学之外、学者们在为整理中国哲学史付出诸多努力的同时、也为实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在这一过程中、王廷相的地位自然不容忽视。Kwuan,

O Hyang以王廷相的知识论为主题、对其思想进行了条理清晰的分析。

3) 王艮和泰州学派(3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Kim, Yeon Jae	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及其道德上形而上学之纲领：以安身和至善之统一为中心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2	Lee, Sang Hun	泰州学派之正己正物和工夫的涵义	《儒学研究》第33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
3	Lee, Sang Hun	卓吾李贽的求道精神和实践工夫	《阳明学》通卷 第41号	阳明学会

这三篇论文探讨了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的思想内容。Kim, Yeon Jae的论文以王艮核心思想中的安心立本说为切入点、对安心立本说中将安心和至善二者统一而论的特点做出了说明。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探讨其道德形而上学上的纲领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了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良知说所具有的思想史上的意义。Lee, Sang Hun的第一篇文章则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泰州学派的思想进行了整理。从王艮到李贽、作者首先对泰州学派核心人物的思想进行了叙述、进而概括出了泰州学派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Lee, Sang Hun则在求道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框架中、对李贽的思想特征进行了阐述。

4) 王龙溪(2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Sun, Byeong Sam	王龙溪的“一念入微”工夫论	《阳明学》第40号	阳明学会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2	Sun, Byeong Sam	如何理解王龙溪的工夫论：“无工夫中真工夫”	《东洋哲学研究》第82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王龙溪是阳明后学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完成了对良知说的理论研究。黄宗羲立足于对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的区分、在他的《明儒学案》中以本体论来说明良知形成论、以致良知工夫论来阐释先天正心之学、从而对龙溪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概括整理。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先天正心之学呢？SunByeongSam在认可王龙溪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工夫论进行全面地分析和理解。他的另一篇论文则对龙溪工夫论中的“一念入微”工夫论进行了详细地探讨。

5) 王夫之(4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Kim, Jin Geun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视之情及他对此之辩驳	《东洋哲学》第44辑	韩国东洋哲学会
2	Park, Yong Tae	王夫之思想中的主器论倾向及华夷论	《东洋哲学研究》第78号	韩国东西哲学会
3	Cho, U Jin	王夫之对张载易学的吸收和借鉴：从主器论的观点出发	《泛韩哲学》第79辑	泛韩哲学会
4	Ahn, Jaeho	试论王夫之的正义观： 以“通义”和“经”“权”关系为中心	《哲学探求》第37辑	中央大学中央哲学研究所

在明清时期思想研究中、就个别人物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王夫之的研究仅次于王阳明、数量十分可观。2015年关于王夫之的研究比2014年多出一篇、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王夫之思想本身无论在量还是质的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四篇文章中、前两篇是关于

华夷论的研究。第三篇通过比较王夫之和张载的易学和气学的方式来进行解释说明、第四篇则讨论了王夫之的正义观。KimJinGeun通过使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王夫之的怀疑论、并通过追溯怀疑思想的历史变迁从而肯定地评价分析王夫之怀疑论的内在线索。ParkYongTae通过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来阐明王夫之怀疑论中出现的对边境少数民族的蔑视之情。ChoUJin通过比较王夫之和张载的气学及易学等重要概念、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Ahn Jaeho通过王夫之的正义观来反观作为当代韩国的热门话题之一的正义的概念。

6) 龚自珍和魏源(两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Noh, Byeong Ryeol / Chun, Byeong Don	关于清末龚自珍“变”思想的研究	《儒学研究》第32辑	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
2	Chun, Byeong Don	通过清末春秋公羊学来看待近代思想的萌芽：以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为例	《东洋哲学研究》第83辑	东洋哲学研究会

这两篇论文集中说明了清末时期出现的对社会改革论造成重要影响的春秋公羊学派的魏源和龚自珍的思想。公羊学派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试图寻求一种从以亘古不变之“理”为中心的思考、向公羊学强调的以变易为中心的思考进行的转变。龚自珍和魏源主张正如万物变迁一般、社会制度也是一定要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应当向西方文明学习。他们所提倡的社会改革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要求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向以个人为中心的近代社会进行改革。同时他们也肯定西方文明的价值、强调对西方文明进行学习和借鉴。这两篇论文正是反映了上述的观点。

7) 其他(两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Lee, Hyeon Seon	程颢的哲学和明代儒学的脱朱子学倾向	《阳明学》第42号	阳明学会
2	Sun, Byeong Sam	当代中国阳明学派研究现状考察：从近代到现代	《东洋古典研究》第58辑	东洋古典学会

关于程颢和程颐哲学思想是否相同、直到今日在新儒学思想领域仍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而Lee, Hyeon Seon则主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与此同时、因二程兄弟在学问上的差异是新儒学思想中所强调的重要话题、所以他也同时考察了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脱朱子学思想倾向十分明显的明代儒学中、Lee, Hyeon Seon将程颢的哲学思想与程颐及朱熹的哲学思想区分看待、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叙述。Sun, Byeong Sam按照时间顺序概括了中国阳明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阳明学(阳明后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这篇论文反映了2008年以后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3. 主要论文分析和评价

提到宋明理学、我们通常指的是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阳明学是理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存在着互不让步的论战。虽然这是由于狭隘的学术观造成的、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在当时以儒学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背景下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的教派论战是无法避免的。在当代韩国的基督教派中、不同教派之间的论战也与此类似。虽然不相信基督教的一般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基督教派、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强烈的异端论战。但是你只要稍稍了解基督教的话、就能够理解为何会存在对这种异端的争论。Hwang, Gap Yeon在《考察阳明批判朱子哲学时的“适否”》中、探讨了阳明学中对朱子学批判的合适与否。他为何要做这样的研究呢？他这样说道：“朱陆之辩和明代产生的阳明和朱子学者之间展开的学术争论、恰恰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理学和心学的争论根源。虽然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积极评价这种论战、但是这种论战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朱陆的后学之间相互全面否定对方的学术价值、并将对方的思想判定为异端、甚至于对其进行政治迫害。一般来说、在理学和心学的论战中、因为理学更加广为人知、所以人们总是认为理学总是攻击的一方而心学为防御的一方、但与此相反、在明代中后期的王阳明、却对理学产生了一种攻击性的姿态、掌握了对学术圈的主动权。王阳明对朱子哲学的批判、虽然在一方面使朱子学派的学者们得以警戒、但其实这也是源于对朱子哲学缺乏深刻的理解而导致的。这篇论文恰恰指出了王阳明对朱子哲学进行批判的不恰当性的一面。作者在文中指出、因为

现有的学说大多是对阳明学进行辩护、为了保证这种评价的客观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朱子学进行了辩护。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王阳明对朱子学的批判缺乏合理性。一是性即理、二是格物穷理、三是知行论、四是朱子晚年定论。鉴于第四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规定并没有明显关系、所以笔者在此篇报告中予以省略。就性即理而言、王阳明的批判在哪一方面缺乏合理性呢？王阳明对朱子哲学之性理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在于把它视为了与告子义外说相同的学说。为什么王阳明将觉朱子义说与告子义外视为相同的学说呢？虽然说对于告子义外说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朱子真的像告子一样认为关于道德是非善恶的判断和行为的正当性及其倾向完全是由行为对象决定的吗？朱子只是在探求行为主体及对象之间一定存在的原理、其次认识之理和心自身之理相互认可、从而使情感活动为善。告子则只是强调外在的标准而忽略了内在主体的自律性理念、但是在朱子哲学中、心对理的认识是来源于心自身的喜悦。此外、因为通过格物穷理而实现的心具理、并不是后天的当具、而是先天的本具、所以心对理的自律、虽是根据法则而产生的意志的立法性自律的其它形态(心即理)、但同时也肯定了作为其他形态的新的自律性。事实上、Hwang, Gap Yeon所想要强调的观点如下：“笔者认为、以朱子和阳明的性即理和心即理为依据的道德论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更不存在谁为异端谁为正统。”儒学的道德论既可以用心即理来解释、也可以用性即理来予以说明、但核心在于本体论、学习论以及宇宙论三者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理学和心学只是在对道德论的说明方式上不同而已、二者所追求的目标、价值观是一致的。虽然说他们对于本体的认识、以及在内圣外王追求上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判断孰优孰劣呢。事

实上、朱子学和阳明学在道德主义问题上持有相同的态度。二者只是在如何实现这一道德问题上拥有不同的主张。朱子着力于客观地确立与老子和释迦牟尼不同的儒学普遍道德、而阳明则是以朱子确立的普遍道德为客观基础、追寻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等关于道德主体建立的问题。

Hwang, Gap Yeon从三点解释了王阳明对朱子格物穷理的看法是错误的。“笔者将从三方面来解释为什么王阳明对朱子格物穷理的看法是错误的。一是在格物一词上对“格”字意义阐释的错误；其次、阳明认为、朱子的致知学习是缺乏根本的学习、此时王阳明所说的“根本”的含义是十分主观的；最后、将穷理规定为在万事万物上追求理、从而将事物的存在性问题和理的存在性问题同一而视。虽然朱子和阳明都将大学的格物致知作为基本框架来表达个人的义理观、但事实上格物和致知的含义相差极为迥异。”

朱子在实现“格”的含义问题上、认为它不仅包括对事物的接物含义、还包括知至含义。而王阳明则认为只有接物的含义、因此认为朱子所主张的即物穷理是错误的。同时批判阳明所说的朱子学缺乏根本、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换言之、正如王阳明所说、虽然不能从心上来寻找性、但是、在根本意义上致知与心性是合一的。因此、朱子的致知活动即有根本、也就清晰地表明了自身人格发展的过程。”最后、他在批判阳明关于朱子即物穷理观点的同时、借用石亭李定稷之口来揭示阳明学所主张的事物的存在性和理的存在性相同的观点是错误的。“孝理永远珍藏在我心中、换言之、作为孝的实践对象的父母的存在性和孝理的存在性是完全不同的。”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对于朱子的知行论作出了如下解释：“尽

管肯定了知轻行重和知行并进的重要性、但是先知后行才是义理的根本。”与此同时、他对于朱子这种论述的正确与否作出如下评价：“笔者也认为、在致良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知行是无法合一的。但是笔者却无法同意、用朱子学的义理、即严格区分心和理、来解释知行无法合一。如上所述、知行无法合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善的认知无法得到强有力的实践。虽然在朱子哲学中、作为认识结果的致知和诚意是相异的结合、但是对于性理的认知、即因为承认了性理是心自身的品德、所以即使不能说是一者的延续、但说是它的结合也并不为过。”

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区分一直以来都是理学和心学长久的论战、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十分关注阳明学的气学要素。为何阳明学的气学要素在现代学者中仍然十分瞩目？笔者将用Kim, Yeon Jae的《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及其道德上形而上学之纲领：以安身和至善之统一为中心》来解释其中存在的原因。

这里笔者将分析被评价为主观唯心论的阳明学和张载的气学是否存在相同之处、并用Kim, Hye Su的《张横渠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解读：张横渠气论中阳明学的体现和适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本研究以张横渠的气论和王阳明的良知说结构上的相似性为基础、集中阐释阳明学对张横渠气论的借鉴。笔者认为、宋明儒学的本质在于构建道德上的形而上学。因此、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以张横渠气论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理论。”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阐述。Kim, Hye Su试图从道德形而上学构建的角度来解释张载和王阳明思想的相似性。“张横渠气论以构成客观现象世界的气学为基础、来说明人类的本性、并尝试揭示其中的道德上的意义。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则强调作为道

德实践主体的人的道德本心、来说明良知理论以及通过良知来试图构建实现万物一体的道德理论。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张横渠和王阳明的学术体系中方法论的差异。但是、从宋明儒学的本质以及道德形而上学构建的角度来看……张横渠和王阳明对宋明儒学本质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一点对于那些对宋明理学缺乏基本了解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但是、对于相关研究人士来说、却并不是什么新的内容。如果说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构建的话、为什么偏偏只说到张横渠、难道王阳明所批判的程颐或朱子不应该是道德形而上学构建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吗?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并不能算是充分的论据。那么、Kim, Hye Su主张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王阳明在建立起良知说时、也借鉴了张横渠的太虚、气以及体用关系的理论结构。所以、王阳明的良知说可以被看做是张横渠气论的王阳明学式的化用。因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在建立自己独创性的良知说的时候、张横渠的气论对王阳明产生了相当大的思想上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Kim, Hye Su的如上论述。Kim, Hye Su在其论述中进一步指出、对于张横渠气论思想上的展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来进行说明：一是朱子理气论的展开、二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展开。如果这一主张正确的话、现有的哲学史叙述中关于王阳明学的内容就有必要进行新的更改、因此其影响将非常深远。另一方面、这里也可以看出、Kim, Hye Su采取的方法是、比较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张横渠的气论。

他在王阳明将良知解释为太虚的部分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这种良知被张横渠解释为太虚、与总体性的气之意义相应。”“即将作

为造化之精灵的良知与张横渠所说的太和不同之处只在于我的心离开了良知。我心中的良知一旦失去、宇宙自然的秩序和万物的创造将变得不再可能。”尽管如此、Kim, Hye Su仍然把这种不一致视为一种进步。“虽然宇宙自然的秩序和创造天地万物的天道有行是由我心中的良知实现的、而张横渠则将客观天道有行的总体解释为太虚、由此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但是其理论的逻辑结构却和张横渠的太虚相一致。同时、王阳明强调、我的心对天道实体的吸引作用以及自发性的人类道德的主体性。这其实是对张横渠太虚所进行的王阳明学式的化用。”

尽管如此、因为无法忽视王阳明思想中关于太虚论据的缺乏、他这样辩解道“虽然王阳明将良知和太虚结合在一起进行说明、在内容上有一定的不足、但是从他对张横渠太虚的逻辑结构到良知的本质意义的说明却是充分的。”Kim, Hye Su的这种主张仍然缺乏能够让人充分信服的论据。

同时、Kim, Hye Su比较了张载气一元论的结构和阳明的“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的论述、还探讨了它们的相似之处。毋庸置疑的是、对于除了王阳明之外的明代理学家来说、朱子所确立的无造作、无情义、无计度之理的概念是不必要的。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不受经验世界制约的、作为形而上学绝对普遍实体的理、并不是其思考的重点。在明代的儒者看来、无造作、无情义、无计度之理可能是于现实相脱离的形式上的虚无之理。因此、连批评王阳明心性论的罗整庵都主张理气一物说。阳明所说的条理之理与朱子所言的作为实体的理是明显不同的。正如明代的其他儒者一样、他也否定了脱离于经验世界的所谓实体之理的存在。

当我们提到变化之理时、就一定需要提到气之媒介。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把它和张载的气论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想要主张阳明的良知论是来源于张载的气论的话、就必须给予上述的论据。这就是说、阳明在赞同心本体之良知的活动性的基础上、阐明了作为气之条理的理、这实际上应该说是以孟子的心性论为基础的、而非张载的气论。

关于阳明学的哲学性论述就先谈到此处。接下来笔者将探讨教育哲学的论述。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他们都是宋明理学、因而都拥有理学的共同特征－－圣人之学。在如何发展圣人之学方面、他们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教育哲学。尽管朱子的哲学十分严格、客观、但却并不能被认为是恰当的圣人之学。而阳明的哲学尽管十分简易和有吸引力、同样不能被认作是恰当的圣人之学、也无法被承认为新儒学(理学)。

Lee, U Jin的论文《新儒学的儿童教育：以朱子与王阳明为中心》可以被视作是学习朱子和阳明儿童论的入门之作、作者在文中探讨了朱子和王阳明的一般教育观、并主张在教育问题上、二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那么二者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们都相信人的天性、并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回复到原来的本真状态、即“复初的教育观””。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教育哲学与成为近代西方教育理念根基的两大模型、即铸型模型和成长模型、所主张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两种模型都将教育视作是“为有所缺乏、未成熟的存在提供智力和道德等方面的帮助、使其得以完善、从而成长和发展为更加完美的存在。”相反、朱子和王阳明则以性本善的理念为基础来阐述和

发展其教育观。但是他们的性善说却又区别于孟子的性善说。他们所说的性善说是新儒学所构建的性善说、即主张“人类的本性在道德上处于完善且纯粹的状态”。在新儒学中、人类本来的面目被认为是“完美者、即圣人”。因此、教育并不是”使不完美的存在得以成长、成熟和发展的活动”、而是“使其恢复、复原到原有的完美状态”。简略地对新儒学教育观和近代教育观做出比较的话、可以说”近代教育主张通过给先天不足的学习者施以教育来使其得以完善、即增加性教育(+)；相反、新儒学的教育观则主张去除那些阻碍学习者实现其先天具有的全善之障碍物、即减少性教育(-)。”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朱子和王阳明的性即理、心即理的差异虽然在哲学及概念分析方面有所差异、但在现实教育论方面、二者的相同之处更加明显。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比较分析朱子学和阳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朱子和阳明的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Lee, U Jin紧接着主张道“首先、他们对于圣人有不同的理解”“。就朱子而言、圣人在德行、聪明、事业、才能等四个方面都取得十分显著的成就、是兼具才智和道德的完善之人。相反、对于王阳明而言、圣人只是针对道德而言的、是道德完善之人、而与知识、才能和能力无关。对于这种差异、王阳明强调“人本源上的同一性”、而朱子则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现实中的差别”。这种差异也同样体现在二者对狷者和狂者的评价上。虽然王阳明对狂者－－曾点持积极的态度、而朱子则批评曾点同老庄一样、无视学习严谨性和循序渐进的特征。他进一步主张称“比起只是拥有高远志向的狂者来说、脚踏实地学习的狷者更应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Lee,UJin从朱子和阳明圣人观的差异出发展开论述、由

此探讨了二者对于狂者和狷者的不同评价。

我们常常从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学习论(修养论)三个方面来探讨宋明理学。虽然从学术体系的角度来看、本体论被视为根本、但从学术目标的角度来看、学习论反而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总是习惯于对宋明理学的理论进行细致严谨地分析、并被圈侑其中、从而忽略了对促成这些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学习论的研究。因此、以教育哲学为切入点来分析朱子学和阳明学理论的这种尝试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解读传统哲学、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哲学深层次的内涵。

Kim, Jun Seung在他的论文《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的知行合一：比较鲁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中比较了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和鲁道夫·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从而探究了王阳明儿童教育观的特点。他将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和斯坦纳的华德福教育的相似之处归纳为三点、下面两点对于我们理解阳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一是、“王阳明和斯坦纳都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加强人们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他们都注重的是过程而非结果。这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牺牲现在、为未来作准备、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领悟的状态。换言之、不能抱着现在浑浑噩噩生活、而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态度、应该是从现在起、就将‘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都会反映在我的生活中‘作为目标。“这体现了王阳明对朱子即物穷理的批评。“不是强调知识的积累、而是强调可以灵活运用知识的人类的状态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难以靠单纯的哲学概念分析而得以解释的阳明学的本质含义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二是、“教育儿童不能按照大人想要的方式、而应当按照孩子们

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无论多么有用的知识、都必须要能够被孩子们吸收、消化才行。关于教育方法、王阳明和斯坦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要将教育孩子和教育大人的方法区分开来。对于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接受教育之前他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真正的授课方式是通过让孩子们参与课堂使其体会到快乐和美好、从而给他们带来内在的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王阳明在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时要强调实现主体自觉(觉醒)要建立在充分肯定各主体的基础上这一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与2014年相比、阳明后学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盛。特别的是、2015年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虽然黄宗羲认为泰州学派并不是阳明学的正统、但是很多当代杰出的学者如岛田源氏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阳明学的精神来源于泰州学派。但是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例如冈田雄彦就对阳明左派持排斥的态度。

Kim, Yeon Jae的《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及其道德上形而上学之纲领:以安身和至善之统一为中心》是一篇论述十分清晰、内容一目了然的论文。这篇论文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概括为安身和立本、进而解释其所指向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

Kim, Yeon Jae在其论文中做出如下论述、“王艮的理论思想可以归结为涵盖生命意识和修养范围的安身和至善。安身是宇宙生命精神转换为人类为生命价值的基础、至善则是将生命价值道德内在化的结果。人类的学习遵循安身的自觉意识、而其恰当的发现就是至善最终的状态。这种看法将安身和至善理解为相互连贯的概念、从而试图确保实现人类存在论上的意义以及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那么这里所说的“人类存在论上的意义以及其道德形而上

学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指的又是什么呢？“王艮的安身立本说并没有像朱子一样将人类的欲望或肉体的欲求视作需要克服和节制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作接受和包容的对象。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朱子学要求个人在适应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来追求个人价值的话、而王艮则主张同等对待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社会道德规范。”

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纲领与朱子所言的道德形而上学有所区别。其不同之处在于、王艮并没有像朱子一样将人类的欲望、或肉体上的欲求视为需要克服和节制的对象、而将其视为应当被接受和包容的对象。这也是阳明后学研究者岛田源氏的主张。当然、这并不是说任由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任意妄为、毫无节制。Kim, Yeon Jae通过谈及“安身和至善的统一之境“、清晰地表达了这里作为包容和接纳对象的欲望是升华后的欲望。

接下来笔者将以岛田源氏的主张为基础、探讨阳明后学的一些思想。而上文中讨论过的KimHyeSu关于气论和阳明学类似性的论文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奠定了一定基础。

Kim, Yeon Jae对阳明学(阳明后学)做出如下论述。“陆王学批判程朱理学导致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共性之间关系的僵化、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特别的是、阳明学在心及其修养问题上、主张天理和私欲的相关性。他们在传承气论的基础上、探讨在良知个体性格上心的普遍性。在阳明学派中、将个体性概念深化为主体高度的学派就是阳明左派、即泰州学派。王艮、王畿、何心隐、李贽等重视在心的范围内、私欲所具有的意义和含义。他们将私欲视为积极而非消极的存在、认为私欲存在于心的本体之中。因此他们并没有像程朱理学一样、主张消除人的欲望、而是主张通过发现欲望来扩大社会社虚的公共性、

因而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因此、他们通过肯定个人的欲望和欲求、来批判主张坚守公共领域的程朱理学的伪善和虚伪。相反、他们却将人欲视为天理的正当性、即将其理解为被赋予了道德合理性的个人主体性。”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词语是、“气论的传统”、‘“肯定欲望”、“王畿”、‘“跟人的主体性”’。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气论传统”之后的出现的文段、即“在良知个体性格中、探求心之普遍性”、来大致推断为何要提及气论。Kim, Yeon Jae将这种气论一直延伸到张载。但是良知的个体性性格在王阳明看来却不是性即理、而是心即理。它也不是气论的基础。当提到性和其他心时、个体、欲望和气论也反映在其中。气论只是心即理的结果、而非前提。

至少对于王阳明而言、“肯定欲望”与肯定“个人的主体性”是不同的。阳明在将现实中活动的心称之为理时、是将珍藏现实人类本来样貌的情感、欲望视作自然的主体本来之样貌。只是这里所提到的现实中的人也需要接受本体中良知的引导。因此、在使用“肯定欲望”一词时、我们应当慎之又慎。

我们之所以说“王畿”属于泰州学派是因为他主张现成良知说。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现成良知说与“肯定欲望”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与其与习惯看法的不同之处。关于王畿的误解一部分来源于其学说的争议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了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影响。

Sun, Byeong Sam的《如何理解王龙溪的工夫论：“无工夫中真工夫”》为我们正确理解王畿的工夫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者在论文中对龙溪学的特征做出了如下阐释。“这里提到的全体放下之工夫学

在致良知工夫论中所包含的深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放弃世俗中的欲望、还包括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当道德判断、或是对于那些看似合理的习惯、传统的判断与良知判断发生冲突时、我们要坚信良知、依据良知来做出判断。换言之、这就是要求我们要放下包括作为即物穷理对象的外部道德、日常知识等其他一切不是按照良知而产生的道德、日常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放下所有由自我产生的判断、才能真正听得到内心深处良知的呼唤。我们也可以从比较意欲和良知的角度来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根据Sun, Byeong Sam的说法、王畿的形成良知说并不是单纯肯定人类的欲望、而是将其视为确保良知自然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王畿肯定欲望的主张实际上和泰州学派十分接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王畿与泰州学派合在一起论述的原因。

如果从阳明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来看、岛田源氏关于阳明学(阳明后学)的理解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阳明学之所以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其反映并引领了时代精神。但是如果从理学的大框架来看的话、阳明学仍然是道德至上主义。虽然这种道德具有默写宋代道德意义的特征、但是在道德主义层面以及追求圣学的层面来看、阳明学者同样从根本上将存天理去人欲视为了学习的基本定理。因此、我们关于阳明学尊重个性、肯定欲望等的评价只有放在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框架中来理解方为妥当。

最后我们来探讨关于王夫之的相关论文。2015年讨论王夫之华夷观的论文共有2篇、分别是Kim, Jin Geun的《王夫之的夷夏之辨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视之情及他对此之辩驳》以及ParkYongTae的《王夫之思想中的主器论倾向及华夷论》。如果说Kim, Jin Geun的论文全

面探讨了王夫之的华夷论、那么Park, Yong Tae的论文则是从王夫之哲学观的角度来阐释其华夷论的概念。

众所周知、王夫之的华夷论充满争议性。他认为我们很难从根本上来认可除中国人之外的其他民族。即“我们虽然可以蔑视夷狄、但却不能断定他们都是邪恶的；虽然他们强夺我们的东西、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一定是无益的；虽然他们容易上当受骗但却不能说是不值得信任的。信赖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共同守护的品德、对于非人的存在、我们根本不需要向其施与信赖。”

Kim, Jin Geun从两种对立的角度来解释王夫之的这种华夷观。“首先、他的这种对边疆少数民族蔑视的情感是有条件、有保留的。换言之、他并不是主张华夏族可以恣意侵占边疆少数民族的领土、而是说当少数民族侵入中原蹂躏华夏族时、华夏族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次、他生活在中原被满族占领的时代、他一生在孤愤中度过、从没有体面地生活过一天。而作为明朝遗臣、他又自责自己没能守住义理。”Kim, Jin Geun指出、从这种背景出发、王夫之的华夷论实际上反映了他自身孤愤之感受、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我们联想到尹奉吉义士、安重根义士以及金九先生所做的义举的话、就更容易理解王夫之的华夷论了。事实上、研读这篇论文时、比起文章的内容、我们更应该关注作者在绪论和结论中表达出的问题意识。

关于王夫之带有蔑视性的华夷论思想的产生、Park, Yong Tae作出如下说明。“将中华和夷狄严格区分的王夫之的华夷论事实上应当追溯到他的气哲学。王夫之认为造成人类不善的原因是质而非气”从形状和质地层面来说、质作为一种外化的形态、它区别于气、是一种

已经固定化、规定化的形态、指的是具体化的、事物质的性质。同时、质作为承载气的工具、也含有“器”之含义。根据王夫之的观点、个别事物的气质之性、即形而上之道、气质之性之外普遍的本然之性只是抽象的理念、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从这种“气“”器””相分离的观点出发、中华和夷狄、即夷夏也就自然被严格区分开来、被区别对待。即中华人和夷狄之气质不同、由此形而上之道也自然不同。此外、如果统摄二者的先于气质之性的世界普遍本然之性不存在的话、中华和夷狄就无法实现统一、以及建立和谐的关系。王夫之的理气论不同于朱熹、他从实在论的观点出发、主张气一元论、进而也就主张差别原理的绝对化、其理论更加保守。“虽然Park, Yong Tae关于王夫之的分析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他通过王夫之气哲学来说明的尝试在哲学上来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评价与展望

与2014年一样、在2015年的23篇论文中、研究王阳明和王夫之的论文占有的比重最大。关于两人的论文加起来一共有13篇(王阳明9篇、王夫之4篇)、占到了全部论文数量的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在韩国学界、明清儒学研究方面、二人受到的瞩目最多。

在教育论方面、2015年的论文中专门分析王阳明思想的论文有4篇、这在9篇关于王阳明的论文中可谓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的比重。这也反映了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深度进一步深化、研究者水平的精进以及研究主题的多变。在韩国学界、从九十年代开始、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阳明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此外、2015年关于阳明后学的论文数量与去年相比也有所增加。这是更多是因为2015年以来研究学者们更愿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成果的积累、从而为未来更深入地研究提供厚实的基础。

但是以明清时期为标准所筛选的这21篇论文就其数量而言也不算丰富、此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明代阳明学(心学)以及清代气哲学的某几位代表人物、可见在韩国东洋哲学界、探讨的人物范围仍旧十分局限、缺乏多样性；研究领域也还比较狭窄、相关研究学者数量也比较少。

此外、虽然这21篇论文的研究问题都十分明确、但部分论文仍然未能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客观地阐述、还有一些论文虽然能够清楚地回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但其分析思路和内容仍然未能摆脱前人的主张、缺乏新意。